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四七）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一一期 ——
（二〇〇五年一月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1a）

【不堪回首】记文革上海高校“暗杀毛主席小集团”案	张洁华
【动态报导】漫谈文革研究	郑仲兵·雷颐·韩钢·李郁
【史料辨正】口述史的局限：以吴德《十年风雨纪事》为例	余汝信
【资料汇编】文革时代的宣传口号	佚名
【往事如烟】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七）	老田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xw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不堪回首】

记文革上海高校“暗杀毛主席小集团”案

• 张洁华 •

一九六八年春天，正在文革浩劫中的中国大地上，又开始了一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上海各高校的造反派立即行动，在青年学生中寻找“阶级敌人”，并进行非法隔离审查和批判斗争，“罪行严重”的送公检法拘押。由于采用了严刑逼供，因此冤错假案层出不穷。我就亲身经历了一桩荒唐不堪，结果却是无比悲惨的假案。

◇ 飞来横祸

当时，我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六九级的学生，对这场“毛主席亲手点燃的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因此游离于运动之外，从不参与任何造反活动，是个道地的逍遥派，闲着便和几个市西中学的老同学打桥牌。不幸，灾难还是降临到了我们这些很听话、非常遵纪守法的学生头上。

一九六八年四月，我们中的吴正（上海科技大学物理系学生），王汝仁（同济大学城市建筑

系学生)，朱中震（同济大学城市建筑系学生），蔡济亮（上海第一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学生）先后被隔离审查。我和费叔子（同济大学地质系学生）尚未隔离，我俩碰了几次头，实在不明白他们出了什么问题。一九六八年五月底，我和费叔子也遭隔离审查。几天后，第一医学院造反派将我和蔡济亮押送同济大学，受三校（同济、一医、科大）联合的“二一一专案组”审查。

为什么叫“二一一专案组”呢？是因为王汝仁发起，我们这群逍遥派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正月初三），每人带一个菜，在他家里聚餐。那天共有十余人参加，坐满了一个大圆桌。由此，专案组认定从那天起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行动的反革命小集团”。

◇ 刑讯逼供

六月四日，我被转移到同济大学的当晚，“二一一专案组”就在一个实验室里对我进行非法审讯。由于是三校联合专案组，因此审问我的人很多，少说也有二十多个。我的专案组负责人是我同班同学王国民。他后来成了张春桥的大女婿。现任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副院长，上海中山医院副院长。

审讯开始前，他们先叫我除掉眼镜，以免我看清楚他们的面目，然后就要我老实交代“反革命罪行”，还反复要我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由于我实在没有什么“罪行”可交代，专案组人员就显得越来越不耐烦了，有人开始打我耳光，他们不是用手掌打，而是用拳头打，打得我鼻血直流，地上很快就积起了一滩血。他们见我仍拒绝交代，几个身强力壮的打手就将我按在地上，用扫帚柄猛击我的臀部，没打个几下，扫帚柄就折断了。后来，打手们将塑料电线编成了打不断的鞭子，行刑者每打一鞭，我即惨叫一声，像触电般在地上翻滚，……我的臀部很快便肿得像一块石头，痛彻心肺。

打手们打累了，就给我上刑。他们将一个四脚方凳倒放在地上，四个凳脚上各钉上一粒硬橡皮，然后将我双手反绑，强迫我用小腿跪在这四粒橡皮上。我当时的体重为六十五公斤，跪在上面二十分钟皮肉就烂了；人刚从凳脚上跌了下来，行刑者就用电线鞭子将我打到凳脚上再跪下，还开心地取笑我像个要被枪毙的犯人。没有几分钟我便又跌下来，再打，再跪，再跌下来……，为的是要我交代一个“特别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 被逼自杀

连续二日的刑讯逼供后，我已被折磨得既不能坐又不能躺，小腿前部的皮肉烂得血肉模糊（至今留着永不消退的疤痕），晚上无法入睡。由于我根本没有任何“反革命罪行”可交代，而又面对如此心狠手辣的刑讯。在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绝境中，我决定自杀，以求解脱。

六月七日上午，我要求上厕所。在厕所隔间内，我用地上的红砖尖角猛击自己右太阳穴，想把自己砸死。但撞击多次，血流满面，人仍未死。正在为难时，看守我的张正维同学也进入一隔间大便。我乘机逃了出去，直奔对面的宿舍楼。那时正是夏收季节，学生都下乡去劳动，因此路上一个人也没碰到。我爬上了三楼的窗台。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温暖而和熙；年仅二十三岁的我，痛苦地和这个我想生活下去，但不容我生活下去的世界告了别，又向生我爱我的母亲作了忏悔后，便纵身跳了下去。

◇ 灭绝人性

我堕地后，四肢多处骨折，昏迷了过去，被救护车送进新华医院，两天后才苏醒过来。针对左腿股骨开放粉碎性骨折的伤情，骨科主治医师建议采用牵引复位固定，让股骨自然愈合，

但需费时三个月。但专案组因无法派人长期值班看守，决定要院方采用安装内固定钢板的手术，而我却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由于手术产生的错位愈合，导致日后我的左腿比右腿要短两厘米。至于左手桡骨骨折和右腿跟骨骨折，医生根本没有作认真的治疗，结果都是畸形愈合。根据“二一一专案组”需要的“治疗”，使我终身残疾。

手术后，我被送回同济大学隔离室。不久，我左腿手术伤口开始流脓，专案组从医务室拿了医药用品给我清洗换药。此时，我从审讯中得知，他们要我交代的罪行竟是“暗杀毛主席”。我们这些在思想上、言语上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的学生，怎么会想到暗杀毛主席？对于这样极其荒唐的捏造，我坚决予以否认，于是他们就停止让我换药。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流脓的伤口瘰管里，苍蝇产下的蛆爬进爬出，惨不忍睹；几天后，隔离室便臭得连看管人员都呆不下去。“二一一专案组”组长王国民恶狠狠地对我说：“不交代暗杀毛主席的罪行，就不要想换药。”他将换药用品放在桌子上，让我清楚看到，但不给换药，然后用阴险而得意的口吻对我说：“你政治生命都不要了，还要肉体生命做什么？”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和未来的医生，就是如此毫无人性地利用我的伤痛进行逼供。

听了这些话，我不由得想问他：“不交代暗杀毛主席的罪行，就没有政治生命了；那末交代了，又会有怎样的政治生命呢？”但在王国民淫威下，我为了保住腿，被迫认了“暗杀毛主席”的罪。但在“怎么去见毛主席？”和“如何搞到暗杀毛主席的武器？”问题上，我又无法使他满意，于是换一次药，便停二、三天，我仍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

◇ 恣意捏造

王国民还担心仅一条靠逼供信虚构的“暗杀毛主席”的罪行，不足将我送去枪毙。一天，他在审讯中问我：“如果你在跳楼自杀前，看守你的张正维不让你逃出去，你会怎么办？”我对这种假设性问题根本不愿意回答，但他紧追不舍，一次又一次地逼问。我为了早点结束审讯，就对他说了“那我就推开他逃出去。”他听了后对我说：“哼！有这么简单吗？”

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下午，第一医学院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宣布拘留“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洁华、蔡济亮”，在宣布“反革命罪行”时，我清楚地听到其中有王国民捏造的“跳楼前企图行凶杀人”的罪行，随即在一片“枪毙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洁华”的狂呼声中，我像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的囚犯，被两个身强力壮的工宣队员架着拖出会场，押上警车。

◇ 医疗事故

我被关进了位于南车站路的“第一看守所”后，虽有看守所的医生隔几日换一次药，但远远不够。我的左腿又烂出了几个排脓的瘰管，每天流出大量的脓水。在看守所这样的恶劣条件下，只能自己给自己换药，用每日发给的饮用开水当消毒药水，用草纸代替消毒棉花、纱布。感谢上苍的圣明和青春赋予的生命潜力，在近二年的监狱生活中，我的左腿竟没有烂掉，奇迹般的保留下来。

由于化脓严重，看守所医生将我送入提篮桥上海市监狱医院。那时病犯都被迫批判林昭的“反革命罪行”，她不久前被判处死刑，后来是从监狱医院的病房里直接拉出去枪毙的。

为我治疗的杜大夫见抗菌素治疗无效，怀疑是内置的固定钢板刺激造成的化脓性骨髓炎，于是开刀拆除股骨上的钢板。手术中，他发现新华医院骨科医生在为我缝合伤口时，将二块纱布缝合在伤口内。他将此医疗事故通知新华医院，并告诉我“这下可以好了，伤口会痊愈的”。回到看守所，我继续每天用开水草纸清洗包扎伤口。然而脓虽流得少了，但伤口却并未见长好。

◇ 痛失好友

一九六九年三月，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将所有在押的高校学生犯，用二辆大型“飞行堡垒”警车，从第一看守所转送思南路第二看守所，并在那里办了一个学生犯的“学习班”。在那里，我见到了同案的吴正，王汝仁，朱中震和蔡济亮，却不见了费叔子。他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前后，因不堪忍受王国民等专案组成员的残酷迫害，在同济隔离室跳楼身亡。他是苏州人，生于1944年，死时年仅二十四岁。

学习班的后期，让大家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乘机将自己过去的“交代”全部推翻。在这个学习班上，我们还认识了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王申酉。令人极为悲哀的是，他竟在文革浩劫结束后惨遭杀害。

一九七〇年六月，在挤脓清洗伤口时，忽然见一样东西从瘰管内冒出，我用手拉出一看，竟又是一块纱布。原来，新华医院的医生是将三块纱布缝合在伤口内，我无从知道这是故意，还是疏忽。从此，流脓显著减少，乃至最终愈合。但是，左腿上留下了瘰管口收缩而结成的六个深疤。

◇ 假案平反

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我和蔡济亮被释放，回到第一医学院，以“反动学生”的身份继续留校“监督劳动，以观后效”。粉碎“四人帮”后，清理冤假错案。一九七九年，历时十一年的“暗杀案”才终于得到了平反。但我们永远失去了好朋友费叔子。每想到他的惨死，我就止不住泪水，我身上除去留下了终生的残疾，还有那永远磨灭不去的非人岁月的痛苦记忆。我们和所有在文革浩劫中遭受残酷迫害的受害者一起，从自己的悲惨遭遇中亲身体验了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恐怖活动，亲眼见到了形形色色的有中国特色的恐怖分子。

~~~~~

## 【动态报导】

### 漫谈文革研究

• 郑仲兵 • 雷颐 • 韩钢 • 李郁 •

座谈人员：郑仲兵（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  
雷 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韩 钢（中央党校教授）  
李 郁（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郑仲兵：今天请各位来，是想听听大家对于文革研究及出版方面的见解。一是有关文革研究和出版现状的介绍和评价；二是提出有关文革研究需要进一步开发的领域和课题。

文革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历史时期和现象，它和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体制，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冷战时期的特定环境，和中国历史传统有什么样的关系？需要开辟什么资源、采访什么人物？文革学研究的方向、目标、措施、手段和方法是什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因是什么？文革历史的分期问题等等，都值得认真研讨。请各位发表高见。

雷颐：文革研究第一步是要有资料。是资料的建立、收集，类似一个小图书馆，给它分门别类，要有规范化的管理。

我觉得文革（的历史）是亟需要抢救的。记得曾经有一个意大利人问邓小平，说中国老百姓都说是五人帮（因为邓小平一直说毛的伟大），是这样吗？可现在，久而久之在老百姓心目中就是把毛给摘出去了。审判江青的时候她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历史的真实究竟怎样？

还有现在有人说是有两个文革，一个上层的，一个是下层的。下层有下层的说法，上层有上层的目的，是不是这就构成了两个文革？实际上当时从下层来说，所有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维护毛，认为党内有各种官僚没有按照毛的指示办，我们只是响应毛的号召，是为了维护、保护毛。比如说一个单位，我认为他们是反对毛的，他认为我们是反对毛的，是两派，但是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保护毛。现在的青年人，受西方的影响很大，他们就认为应该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他说因为文化大革命谁都可以发表意见，当然谁都可以打倒谁，任何人都可以有理由往别人头上扣一个政治帽子。我说是，但是你别忘了，文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用毛的话讲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实际上是极端的专制，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民主。其实还有一句话，非常简单地反映出文革的面貌，就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这是文革中最常用的口号。什么是民主？我可以支持文革，你可以不支持文革，这才叫做民主；只允许我说你反文革，你说我反文革，这怎么能叫民主呢？

另外在文革中的日常生活中，后来就感到是很困难很困难。恐怕北京要好一点，到外地有的地方连酱油都很难买，国民经济确实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从生活中感觉出来的，因为文革中很多的数字都是假的。现在就有人根据文革中公布出来的什么“国民生产达到什么高度”来判断：你怎么说它是崩溃的？六六年到六八年这两年里没有统计，基层都没有统计，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家统计局花了很大的力量，做了事后的评估，把那两年数据给补上了，也就是水分是很大的。另外是不是还有数据，那就不敢说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有些搞研究的，就是根据那时候的数据下结论，就说你们是胡说。（韩钢：邓立群评价文革就说：政治是动乱的，文化是凋敝的，经济是发展的，国防是巩固的，外交是成功的）。问题是除了数字，经济的好坏表现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火车晚点是不正常的，但是到了文革后期火车晚点是正常的（当时铁路局一定会有记录的），到后来连票都不保证供应，这就具体反映出来了。

文革的分期问题。研究文革要分期，分期要看你研究的角度，根据你的视角，根据你的需要。如果分得细的话，可以有很多阶段，比如说六六年十一月就可以作为一个划分界限。因为十一月《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一下子就把毛的要打走资派的意图表现出来了。因为一开始刘少奇讲“要怎么搞文化大革命我也不知道”，这时一下子就清楚了。那些跟着毛跑的老红卫兵一下子就知道文革是要对准自己爹妈的，就开始反文革了。这个阶段再往后又可以分一下，比如说六七年四月戚本禹那个文章（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出来，把刘少奇几乎给点出来了。以后就是全面大乱，就是各个地方的武斗，就是六七年白热化直到“七二〇”事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当然六七年“一月革命”也应该算一个阶段。“二月逆流”、反王关戚、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等，要是细分可以分做很多阶段。“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还有不一样的地方，清理阶级队伍是各个单位的群众专政，到“一打三反”有很多是通过正式的法院判刑，遇罗克就是这个时候枪毙的。从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就可以到“九一三”，这是一个阶段，实际上“九一三”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就宣告了毛的路线的破产。我那时候已经下乡了，知青和很多干部听了传达都在私下里议论，尤其是觉得《五七一工程纪要》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所以李慎之说“到现在为止对毛的认识没有超过《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之后就是邓小平的复出整顿，这个阶段有意义，主要是和邓文革后的复出和发展有联系，是为将来打下一个深厚的基础。我觉得从大的方面可以分这么几个阶段。

韩钢：最早的研究要从七八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实际上胡耀邦提出要早一些，他到中央党校以后，布置中央党校研究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时，提出“十次路线斗争这个提法对吗”？这就触及到文革（以下称为“它”）。比较集中的是中央工作会议，后来就是叶剑英的国庆三十年讲话，然后有一个《决议》。这项研究最早是官方开始推动的，但是民间的反思又比官方的更深，在一九七七年和七八年出现过一批反思的伤痕文学，什么《班主任》、《伤痕》。新的高潮就是到了八十年代初，反思文章比较多，但都不是很系统的学术研究。八一年《决议》一方面起了一个好的作用，就是能够讲毛泽东的错误，问题是另一方面又只能按照《决议》去诠释，所以大概从八一年以后官方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就停下了。民间的研究没有停止，但是在八十年代的前期没有太大的进展。

到八十年代中期又有一个高潮，就是它发动二十周年、结束十周年的时候。民间学术界研究党史的，在这方面出了一些成绩，高、严的《十年史》，还有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这两本书是民间研究在当时最有影响的两部书，前者是它国内第一部专著，但学术价值不如后者。六四以后才出版了金春明的《史稿》，四川出的，很快被禁止发行了。不久，席宣和金春明出版了另一个版本《简史》，是经过官方批准的，这本书在《决议》的框架下有一点研究者的思考，基本上是诠释的。

到目前为止官方批准它的书只有两本，一个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中央宣传部批准的），还有一个就是席宣、金春明写的《简史》。我认为，国内研究它水准最高的专家就是王年一，他在史料考证方面做的那些研究的工夫，目前研究它的没有超过他的，通史性的研究著述就数王年一的这本书了。

国外研究的比较多，但是作为通史性的著作现在还没有出版。麦克法夸尔原来写的是前史（从四九年到六六年），正在写文化大革命史。他在哈佛开了这门历史课，是个选修课，但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在哈佛这门课是选修最多的，曾经达到四百多人，非常轰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又进入一个低谷）。除了通史性的研究之外，国外对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比较多，比如澳大利亚的孙万国写了《古有窦娥，今有林彪》，他认为“九一三事件”林彪是最大的冤枉者。还有专门研究这个期间的学校、教育等等的著作，这类东西非常多。而且西方学者的东西还更有影响一些，比如说最近国内出版的一本《毛泽东传》，菲力普·肖特写的，从学术上说，在国内的学者眼里，水准一般，但是非常有影响。九九年出版，今年在北京出了中译本，不到三个月印了三万册。北大、民族大学等高校还有研究机构到处请他去讲座。就是像老雷打的比方，英语就是一个强势语言，再加上是一个西方学者或者是记者写的。（雷：这个作品翻译过来比原本更糟，错误很多。“鄂豫皖根据地”翻译成“鳄鱼湾根据地”，“包产到户”翻译成“个人耕作”。）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国内有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中共历史的研究出现了民间化的趋势。民间化本身有一些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东西，大量的关于文革的著作出版，包括人物、事件、专题的。当然，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夹缝中出现的。比如关于林彪的书，按照官方的意愿，是根本不能出版的，但是现在关于林彪的书包括传记还真不少，西藏出版社、远方出版社、湖北出版社的。在境外也出版了不少内地研究者的民间著作，比方说唐少杰的《一叶知秋》，专门研究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的。类似这样的研究的著作，虽然主流意识形态一再控制，但是它不可能控制得像一块铁板。还有一本书写“内人党”冤案的书，被禁了，但是已经出版了，虽然不是直接讲它，但是它是其中的个案。

在内地，研究这段历史的档案最具影响的是国防大学的《资料选编》三卷本（不是公开出版的），是目前国内研究这方面资料最完整的。官方内部有一个三卷本的资料，是为了起草《决议》编的，那更是不可能公开的，但是国防大学的三卷本收集了一些官方的资料。海外去年出版了一套《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三千万字，目前为止是海内外公开出版的最完整的文献。八十年代后期，李郁他们搞了一件很大的工程——《文化大革命词典》，可惜现在出不来，如果出

版，也是了不得的事。九九年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开了一个座谈会，就是研究文革的，邓力群、汪东兴都参加了，王年一也被邀请了，那是官方的一次讨论会。一位与会专家流着眼泪对林彪这个案子提出了质疑。

另外要搞口述史。现在搞口述史的，国内也有好多家，但是我觉得并不冲突，人越多越好。历史就这样，大家都来做更清楚。做口述史最好有点计划，如果完全盲目，可能会事倍功半。它最好是分两层，一个是上层的，一个是下层的。蒯大富据说最近在写回忆录，不知道其他的红卫兵“领袖”怎么样，聂元梓回忆录早就写好了。这是一个层面，再有就是高层的，现在确实存在一个抢救资料的问题。最近出版了吴德的自述，谈了一些过去不知道的情况，有史料价值。

对已经出版的口述著作需要考辨。《王力反思录》只能是做一个参考，要是完全以他的书做历史依据，那就上当了。（雷：比如因为康生对王力特别好，连康生贪文物，王力都说没有的事。据章立凡说，返还的好多文物康生都盖了章。）我举一个小例子吧，六六年二月份去东湖向毛汇报《二月提纲》那件事，他的书里写着周扬什么的都去了，但是周扬并没有去，他自己没有参与这个汇报，他就写错了。香港出版的《文革御笔沉浮录》，作者是北大的梁效班子一个主要成员。这类人物不了解多少上层情况，但是亲历了一些事情，对于澄清真相不无价值。比方说《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都说《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是江青等人的夺权纲领，但是这本书里说这篇文章根本就跟姚文元没关系，是当时《光明日报》一位负责人布置的一个任务，那个负责人跟姚文元也没关系。后来为这个事，他一直被审查，一直到八二年才放出来。这就提供了一个新的说法，研究这个问题就需要做更多的考证。类似这样的材料对澄清关于它的官方说法是非常有价值的。（雷：但是对所有的说法，尤其是以《王力反思录》为代表，就应该有个警惕，一定要有警惕性。还有一个典型是章含之，她把乔冠华干的坏事，都给过滤掉了。）章含之的回忆录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带有一种情绪，一些应该反映的重要的历史情节，她却回避了。（雷：有的外交部老人看了这个回忆录，非常生气，但是外交部的老人都不愿意说，他们觉得说出来伤害了乔冠华。实际上都知道给周恩来最后一击的是乔冠华的发言。李：章含之在书里暗示，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几个月，章含之跟乔冠华，好像是为保护老干部，从侧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些所谓工作，就是后来华国锋把这两个人打下去的原因。实际上是跟四人帮勾结在一起，反对唐闻生、王海蓉。乔和章介入了党内的最后的斗争，但是他们怎么介入的，江青怎么跟他们联系的，实际上她真正应该说的是这个，包括乔七三年批周的事，也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的。至于说乔冠华能讲出周恩来什么东西，对毛泽东的决策未必有多大的影响。但是他最后一段的情况扑朔迷离，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前这一段，他们两个人搞些什么东西，包括乔冠华的联合国发言里的“按既定方针办”，有，但是后来给删去了，以后整乔冠华的时候，说他“又在联合国讲了”，章含之去查档案发现没有，乔冠华没有讲，但是最后还是把这个罪名加在他身上了，实际上讲没讲没什么关系，就是澄清了，人家照样整他。雷：因为他在外交部倒周倒姬鹏飞。李：他在最后几个月肯定陷到江青、张春桥他们的某个活动当中去了，但是这个官方没有讲，她也不讲，就像邓小平说的“宜粗不宜细”，就是说大体上你乔冠华犯错误了，犯的什么错误，这属于高层机密，很多都是这样。）

关于分期。西方学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文革到一九六九年九大就结束了。要细分可以划分出若干阶段，但目前国内主流意识形态上，也包括民间的学者比较认可的是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六六年到六九年九大，这个阶段就是毛要解决刘少奇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六九九年到七一年“九一三”事件，这个阶段在高层次实际上有两个路子，林认为到六九年它结束了，所以在起草九大报告的时候林和陈伯达跟张春桥、姚文元发生冲突，陈伯达是根据林彪的意图，林彪认为它完结了。但是毛不这样看，毛认为到六九年整个国家的体制要按照他的想法去走，什么革命体制啊，清理阶级队伍啊，教育革命、文艺革命，整党建党，就要按照他的意图来建设这一个整套的国家体制和社会体制。毛对林和陈伯达就不满意。说从九大召开以后一直到“九

“一三”事件的两年多是林和江两个集团的矛盾，这只是表面现象，甚至表面现象也不很多，实际是毛和林的矛盾；第三个阶段是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个阶段的内容是否定它和维持它的冲突。当然，要是再细划，三个阶段还可以分成很多个小阶段。

现在的研究还有好多的领域和专题是薄弱环节。比方说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生活，这块现在基本上是空白没有人去做。其他像政权体制（这个时期的革命委员会体制，到底是怎么运行的）、一些个案研究，这些领域都可以做很多实证性的工作。还有农村，中国农村在整个当代历史上有三个东西是贯穿始终、时沉时浮的，是中共农村政策的晴雨表，就是包产到户、农村集市贸易、农民自留地，政策松的时候它冒头，政策紧的时候它就被打下去。再比方说朝农经验、共大经验；还有一些写作班子（像罗思鼎、洪广思、梁效），著名的刊物（像《朝霞》、《学习与批判》），都是很好的研究题目，但是现在基本上属于空白。

李郁：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整合现在的资源，不要从头开始。因为文革的事情上上下下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把现有的东西怎么整合条理化，比如通过召开座谈会、利用网络等等。

关于文革，应该有一些新的研究视角。文革有一个权力的逻辑，从上到下都充斥着权力的逻辑，这是一个相对的主流逻辑，现在大家研究得比较透彻。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新视角呢，我就一直在想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权状况。根据我们现代文明的人权标准可以研究一下从上到下当时中国的人权状况，这样就可以摆脱所谓内部的逻辑（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一堆糊涂账），就像从理性这个视角看待中世纪一样，我们建立一个人角度的视角。用现代人权的一些基本的概念，来看当时十年中国的人权状况。（韩：文化大革命除了毛以外，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种不安全的状态。就像斯大林晚年联共中央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第二天还能不能活着回来，斯大林的一个电话就会引起恐惧。）从刘少奇一直到普通老百姓，从普遍人权这个标准去看，就可以抽出很多不必要的逻辑，什么革命逻辑之类的。文革中的十年中国人究竟是在一个什么状态下？如果这个状态明白了，再研究发动文革的理论是什么，然后再研究毛泽东，反过来推就可以得到很多。不管是刘少奇还是地富反坏右，包括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江青，都遭受了无数的不白之冤。如果按照现在的人权标准，加在林彪、“四人帮”身上的罪名，很多不成为罪名，很多坏事也不是他们干的。江青迫害了无数的人，也有无数的人迫害她，更不要说林彪和吴法宪，这里首先就要恢复事实。事实是什么？（雷：我有一次看到凤凰卫视采访陈佩斯，他回忆文革时就说最怕听到大卡车的声音，那时候红卫兵抓人都是这样的。他说即使八十年代一听到卡车的声音就心惊肉跳。这个就反映出最典型的人在恐惧下的状态。）然后再去研究那个制度下一系列的决策行为模式，包括某人告密，也未必是他自愿的，甚至可能也是一种自保。所以把那个生存状态、那个事实完全恢复，文革的事情就搞清了一大半。不容易搞清楚的是权力的斗争，因为权力的斗争现在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党内斗争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个人都是盲人摸象，你只是窥测一角，不可能看到全豹。（雷：所以西方搞文学的以张明迅为代表的一批人，是最可怕的文革研究者。他们跟历史学家又不一样，历史学家是根据事实，他们是从观念出发，研究“一九六八年学运”。他们在西方搞学运、极左思潮，根本不看中国的现实，就是从他们自己的观点中来理解文革是什么样的，而且是以文革的文本为依据。）所以那个白休德，他就觉得文革是一个最平等的社会，从政治权力、从人的经济状况的角度，其实他看的全是文本。毛泽东说“权力是谁给我们的？人民给我们的”，在西方左翼思潮来看这太符合西方的理念了，因为他把权力的来源都说清楚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这一套其实有历史渊源，是从俄国的民粹派来的。左翼的东西有一种原罪感，知识分子就是得改造，最后就演变成了文化大革命合理，还得再来。比方说工农兵上大学在西方左翼看来这是实现权利，农民的子弟能够上学，工人的子弟能够上学，军队的士兵能够上学，这表现了一种平等，其实他不知道这个平等后面是极不平等的。（雷：所以说档案是不可靠的。当时工农兵上学，要查他们的入学档案都是通过正常途径，都是经过群众评议、单位推荐，要查可以说没有一个走后门的，这就是档案的误区。）这个实际上都分析得出来，比方说档案上你填你父亲是个反革命，那绝对上不了大学，当时有



问题的家庭绝对不在少数。所以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在中国人民中间得到的欢呼有百分之九十九，在其它问题上大家都是有分歧的，但是恢复高考当时被认为是绝对公平的，反过来证明工农兵上大学是不公平的。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韩钢发言根据《五柳村网站》的修订稿）

□ 原载《往事》第一期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转载自《新世纪》网站

~~~~~

【史料辨正】

口述史的局限：以吴德《十年风雨纪事》为例

· 余汝信 ·

吴德的《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是当代中国出版社今年一月推出的“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其中一种。甫一面世，即引起文革史研究者群的密切关注。

根据吴德口述整理者朱元石先生所称，对吴德进行访谈的时间是1993年的夏天，时吴德已年届八十。“老人细声慢语，说话非常平稳，用词很讲究，有长者风度。他有一个几乎是习惯的动作，不时地用他那苍白的手去抚摸自己的头顶。清癯的脸上虽两眼炯炯有神，但总让人觉得是一个病人”。此后，吴德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未能继续其话题。两年后的1995年11月29日，吴德去世。（1）

口述是近年史学界应用广泛的一种方法，尤其是对吴德这样年迈体弱、自己已不能动手写作的老人，口述方法对抢救现当代史料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诚然，如口述史的推崇者所言：“当历史学家们从一段距离之外去研究历史的行动者时，他们对这些行动者的生活、观点和行动的刻划将总是要冒进行错误描述，将历史学家自己的经历和想象投影到对象之上的风险：一种学术形式的虚构。口头证据，通过将研究的‘客体’转化为‘主体’，有利于一种不仅更丰富、更生动和更令人伤心的，而且更真实的历史的形成”。（2）

惟我们在肯定口述史价值的同时，应该清醒认识到它的局限所在。正如用口述方法研究中国知青史颇有收获的刘小萌先生所说：“口述中包含各种不真实成分，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记忆出现偏差，如记错了时间，人物张冠李戴、事件因果关系错乱等。而受访者站在今天的立场回溯历史，犹如戴着一副变色镜去眺望远处的山景”。（3）

口述史的局限性，在吴德一书中自然不可避免地同样存在。吴德一书分为十三部分，本文仅列举该书第一部分“动荡的北京市委”中的数例予以辨析。

一、为什么是吴德？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1966年5月中旬，李富春同志打电话给东北局，传达中共中央调我到北京市工作的决定。我当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4）

当时，吴德这样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除北京市外，尚有27人（还不算各中央局的书记亦可调用），为什么偏偏选中了吴德？吴没有交代。此外，为什么是李富春打电话？李当时不过是政治局里的二十几人之一（三个月后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方增补为政治局常委），也不分管中央人事调配工作，这一点，吴德也没有交代缘由。我们今天虽有疑问，但已很难判定吴德

所言的真确性。

反而，同时调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对挑中吴德却有如此说法：“5月23日，……，我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讨论时我说：‘我一个人不行，调一个人做副书记’。候选人提了两个，吴德和华北局的什么人。1936年我和吴德搭过班子。他在枣园工作过，康生了解他。最后决定吴德任第二书记，郭影秋、高扬文、马力为书记”。〔5〕

李雪峰的回忆，思维上有些跳跃，连带语句也跳跃，但似乎不难解读。“1936年我和吴德搭过班子”是指当年李曾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吴德任副书记。“他在枣园工作过，康生了解他”，枣园，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情报部驻在地，吴德曾任中情部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康生是部长。李雪峰的意思似乎应该是说吴德的人选，他和康生都是同意的。的确，当时李本人的意见非常关键，而康生的作用也不可忽略，他是在南方的毛泽东与处在北京一线的中央核心之间的传话人，在毛那里能说得上话。

如此说来，李雪峰的回忆所揭示的高层内幕应比吴德的口述更多一些。吴德的口述其实是他圆滑的官场风格的最好体现，而李雪峰的则有更多的棱角未磨平，这也是李的回忆录全文至今还只能躺在中共党史出版社的档案柜中的重要原因吧。

调自己进京的缘由，相信吴德多少是知道一些的，他滴水不漏，不说就是了，尤其是与康生的关系。这是一种口述过程中的所谓“选择性回忆”，即：对自己不利的事，少提、不提为妙。

二、首都工作组能改组北京市委吗？

“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二是改组北京市委。我来北京前的二十几天，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6〕

吴德这一段有两处重要失实。

1、改组北京市委与首都工作组无关。

改组北京市委，是批判彭真之后的必然步骤。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1966年4月中旬在杭州毛泽东处会议时已定调的事情。具体执行，是5月在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决不是5月中旬后才正式组成的“首都工作组”。〔7〕

根据《周恩来年谱》，周5月15日与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提出，遵照毛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工作组。首都工作组的主要职责为“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远远没有改组北京市委这样大的权力。〔8〕

2、关于华北局工作组

吴德口述的华北局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的时间、领导人都有些偏差。

华北局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的时间是5月11日，据吴德自己口述，他抵京日期是5月24日，这中间相距只有十三天，而不是吴德所说的“二十几天”。工作组的组长是李雪峰，副组长是池必卿，黄志刚是率华北局组织的另一个级别较低的工作组进驻北京日报社。〔9〕

此外，吴德说王尚荣是首都工作组的办公室主任，疑点也很大。根据《周恩来年谱》有关首都工作组的记载，王尚荣未列为首都工作组的成员，其本人的生平大事年表也没有担任过该职务的记载。（10）

三、有关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的几个问题

“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局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把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又派来一个局长李钊。后来，李钊也被捕了”。（11）

这一段话有以下几个问题。

1、进驻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组是以何名义派出的？

以吴德的说法，工作组由公安部副部长率领，但又以华北局名义派出，显得有些不伦不类，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1949—197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派驻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组名为“公安部和中共中央华北局联合工作组”，1966年5月12日到达北京市公安局，这就名正言顺得多。

2、逮捕的是什么人？

根据《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1949—1978》，1966年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决定：对冯基平、狄飞、阎塘、邢相生、吕展、阎前江等实行隔离反省，对李一平、张烈实行撤职反省，派李钊、刘坚夫、程诚、马星五等人到公安局，分别任局长、副局长、政治部主任等职。

隔离反省及撤职反省的八人中，冯基平、狄飞此前早已先后调离市公安局。冯基平1953年至1964年为市公安局局长（后以副市长或市委书记处书记兼），1964年9月调任陕西省委书记，狄飞1953年至1956年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后调任公安部十二局局长。邢相生为现任局长，吕展、李一平、张烈为现任副局长（阎塘、阎前江情况未详）。所以，准确地说，逮捕的应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前任及现任负责人，而不全是现任领导。为什么连前任都要逮捕？那只有天知道了。

3、回避了本人宣布改组市局领导班子一事

还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1949—1978》，1966年6月7日，“市公安局召开干警大会，宣布改组市局领导班子，撤销公安局原负责人冯基平、邢相生等人职务，隔离审查”。而据《冯基平传》，这次五千多名干警参加的大会召开时间是在6月5日，由新上任的吴德本人在大会上宣布李钊等人的到任和对冯基平等人的“隔离审查（实为逮捕）”。（12）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有关改组北京市公安局这一段，吴德口述所表露的问题，一为史实的偏差，二又是所谓“选择性记忆”，对自己不利的，虽是自己亲身参与的，避之不说则吉。

四、不完整的市委书记处书记名单

“北京市委5月下旬改组，中共中央决定：李雪峰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市委第二书记，

北京市代市长，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改组后的市委书记处书记是高扬文、郭影秋、万里、陈克寒、赵凡”。〔13〕

根据《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1949—1978》，1966年5月，增加高扬文、郭影秋、马力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力兼任市委秘书长。吴德在这里遗漏了马力。

马力，调北京市前为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文革中于1970年3月调离北京市，回河北任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5月任中共河北省副书记。1977年后曾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也算个闻人。

完整的情况应该是：改组后的北京市委书记处，增加了高扬文、郭影秋、马力三人，万里、陈克寒、赵凡为原书记处书记留任。

五、准备拘留蒯大富？

“这时，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蒯大富也起来了，他提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一看见这个口号，李雪峰和我商量认为，这个来头大有问题，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怎么能打倒呢？我们认为是有坏人跳出来了，不能置之不理，要准备拘留蒯大富。”〔14〕

联系上下文，吴德这里说的是1966年六七月间的事，蒯大富此期间已提出打倒刘少奇了吗？而吴德因此还要准备拘留蒯大富？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蒯大富1966年六七月间，还是一个因反工作组而受压的大学生，远还算不上是什么“造反派”。根据当年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宣传队编印的《清华大学大字报选（蒯大富同志的大字报）》，蒯大富等6月16日写了《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6月23日写了《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的大字报。这两张影响较大的及期间另外几张大字报，矛头都是针对派驻清华的工作组的，根本没有涉及刘少奇的问题。即使是对工作组的领导人叶林，蒯大富等人也没有用“打倒”这样的说法，更不用说要去打倒刘少奇了。6月24日至7月15日，工作组在清华开展反蒯斗争，召开了两次批判蒯大富的全校大会，整个7月份，蒯为自己的问题自顾不暇，又何以再能提出去“打倒”谁？

7月29日，清华工作组组长叶林宣布，新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工作组撤离学校。据《周恩来年谱》，周于8月1日按照毛泽东意见负责处理清华问题，当天，周两次找蒯大富谈话，了解情况。8月4日，周恩来参加清华辩论大会，批评了工作组的错误，公开为蒯大富等平反。试问，当时周恩来要平反、要亲自接见谈话的蒯大富，吴德怎么能说成是坏人，而且要准备拘留？

红卫兵明确提出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派，公开以大字报形式点刘、邓的名，应该是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后，吴德说蒯大富在当年六七月间已提出类似的口号，显然是记错了时间，将其向前漂移了至少3、4个月。既然前头的记忆有误，后面的“李雪峰和我商量认为”以至“要准备拘留蒯大富”等等，以逻辑推理，也难以站得住脚。

六、存疑的“大学工作委员会”

“1966年7月28日，新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这以后，我感到没有办法领导运动，在京西宾馆开的一次会议上，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周总理说中央各部委所属大专院校都交由

北京市委统一领导，市委成立一个大学工作委员会，各部各口派人参加。

周总理指定我为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主任，陶鲁笏为副主任。委员有孔原（调查部）、丁国钰、李清泉（外交部），吴星峰（石油部）调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各部各口负责接待相应的学校的师生，派联络员到各学校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大学工作委员会派联络员的事情被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批评成立大学工作委员会是与派工作组性质一样的错误，要立即撤销”〔15〕

这段口述，存在几个记忆上的偏差和史实上的疑点。

1、一般认为，新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是在7月29日。如《周恩来年谱》7月29日条目所述，在新市委召开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李雪峰根据毛泽东指示，以中共中央名义宣布撤销派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市委虽已在7月28日作出《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但也是在7月29日大会上才由李雪峰首次宣读的。

2、据《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1949—1978》，8月5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成立市委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和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通知》。《通知》中说，为了加强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的领导，根据中央指示，市委决定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分别设立两个委员会”。据该《通知》所述，该委员会的名称应是“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不是吴德所言的“大学工作委员会”，其职责范围也没有吴德所言那么大。

3、陶鲁笏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排名于薄一波之后的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中央工交政治部主任（此前，他是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孔原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他们的职务级别与吴德不相伯仲，以一个中央正部级高干的身份，是否可能屈就北京市委下属的一个什么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大有疑问。另据《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1921—1987》，丁国钰（原外交部干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吴星峰（原石油部政治部主任）于1966年10月分别调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委，丁、吴两人此前调任北京市委下属机构的领导职务，倒还是可能的。

七、矫玉山不是“焦玉山”

“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焦玉山打电话找吉林造反派的头头说，立即释放吴德。焦玉山还在电话中批评他们这样搞是错误的。

电话打完后，吉林的人告诉我说，刚才接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别人的话可以不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要听，立即放我出去。他们还问我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是不是有焦玉山这个人，怎么找这个人等问题。

我说中央文革小组有这个人，可以到钓鱼台去找”。〔16〕

吴德说得并不对。钓鱼台没有“焦玉山”这个人，只有矫玉山。矫焦虽同音，但却把人家的姓氏搞错了。

矫玉山当时在钓鱼台薄有名气。他原是王力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任副部长时的秘书，〔17〕后随王力到中央文革小组工作。惟在1966年冬吴德被吉林造反派揪住不放时，矫应该

不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组长。

十分了解中央文革小组内情的王力对其办事机构有此回忆：“十一中全会后，文革小组建立制度，从各处调人。要我兼办公室主任。没干几个月，到六六年十一月就不要我当了，改由解放军报的宋琼为主任。后来不到两个月，宋琼又被江青打成‘胡痴小集团’，也就不要办公室了，叫办事组。没有头，就要王光宇负责事务。他是马列研究院的一般干部”。（18）

而时为文革小组成员的穆欣后来对矫玉山也有更详细的回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于1966年5月初住进钓鱼台的时候，大都住在15号楼。初时未设办公室，只有从中央联络部调来的矫玉山一人作秘书，忙得几乎24小时不停地连轴转”。穆欣还说，自1967年1月后，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由王广宇、矫玉山负责，“1968年1月13日凌晨，矫玉山在中南海怀仁堂被江青下令以‘特务’罪名拘捕，直接送进秦城监狱，被‘审查’了七年半之久，1975年5月16日方获释出狱”。（19）

八、吴子牧与“天津矿冶学院”

“再讲几件事说明当时的混乱状况。天津矿冶学院的院长吴子牧调到北京市委大学部任部长，他在矿冶学院几乎被打死，吴子牧的妻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吊自杀了。吴子牧在被打时，幸好大学工作委员会的吴星峰赶到了，吴星峰扑在吴子牧的身上说：我是市委大学委员会派来的，不能再打了，再打就打死我吧！这样才把吴子牧保护下来。”（20）

吴德这段口述既有史实上的偏差，也很容易给读者造成误解的不明晰之处。

真实的情况是：吴子牧（1914—1970）江西宜黄人。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共，建国前曾任辽宁省委书记，建国后调到高教战线，1950年11月，出任校址在天津的中国矿业学院副院长。1953年，学院迁至北京，改称北京矿业学院，吴随校到京，历任副院长、院长、院党委书记。1959年11月，调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大学科学工作部部长，1965年11月调外交部准备出任驻外大使，未几，文革爆发，未能成行。（21）

吴德的口述，将在天津的中国矿业学院（后迁京改称北京矿业学院）误为“天津矿冶学院”了。此外，吴德的说法似乎使人觉得吴子牧是文革前夕或文革中才调北京市委的，其实吴子牧早在1959年已任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部长，文革前夕已调外交部。吴子牧在文革中的具体遭遇我们尚不大清楚，但即使有学生要揪他，也是北京矿业学院而不是什么“天津矿冶学院”的学生。

口述史的整理，目前存在着两种意见、两种办法。其一是口述者怎么说，整理者就怎么记，对原始素材不作任何加工改动，以期保留口述的“原汁原味”；其二是整理者对照文献档案，对口述的失真失实处、记忆的偏差处，或征求口述者意见后作出改动，或由整理者自行作出适当的校正性注释。笔者赞同后一种办法，因前一种办法得到的往往并非是信史，而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所用的恰恰却是前一种办法。以本书的整理者所处的位置，其实有相当优越的条件可以将口述素材与历史档案相互补充印证，即使如吴德自己所坦言“我的记忆不行”，（22）整理者也可用注释加以补救，使其口述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可惜，整理者没有这样做。而以前一种办法所得到的口述纪录，对科学的历史研究所能起到的作用毕竟是非常有限的。

注释：

（1）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前言部分。

〔2〕保罗·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页93。

〔3〕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页13。

〔4〕同〔1〕书，页3。

〔5〕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回首文革》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第二版），页606。

〔6〕同〔1〕书，页4—5。

〔7〕〔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30—33。

〔9〕《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1921—1987》（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页312、314。

〔10〕《王尚荣将军》（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页650。

〔11〕〔13〕同〔1〕书，页5—6。

〔12〕《冯基平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页330。

〔14〕同〔1〕书，页9—10。

〔15〕同〔1〕书，页12—13。

〔16〕同〔1〕书，页16。

〔17〕《通讯录》（国务院秘书厅编印，1965.9），页263。

〔18〕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页939，王力原文中的王光字应为王广字。

〔19〕穆欣：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总第69辑，北京：中共中央出版社，1999.3），页63—94。

〔20〕同〔1〕书，页17。

〔21〕1965年11月后大学科学工作部未任命正部长，这也是聂元梓等1966年5月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只点了该部副部长宋硕的名的原故。

〔22〕同〔1〕书，页21。

~~~~~

## 【资料汇编】

### 文革时代的宣传口号

• 佚名 •

崇拜类：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让我们共同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一心想着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  
生为毛主席而生，死为毛主席而死  
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反对我反对  
把对毛主席的忠诚，融化在血液中，铭刻在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上

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三忠于四无限）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语）  
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柯庆施语）  
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门合语）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跟着毛主席，永远闹革命！跟着毛主席，世界一片红！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

#### 仇恨类：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林彪语）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八亿人，不斗行吗（最高指示）

#### 对人民的要求类：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高指示）  
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最高指示）  
要斗私批修（最高指示）  
党叫干啥就干啥，做一个齿轮与螺丝钉  
宁可前进一步死，不可后退半步生，  
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林彪语）  
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大庆人语）  
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 工作指导类：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  
抓革命，促生产。  
深挖洞 广积粮 不称霸  
要准备打仗

以钢为纲，以粮为纲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领导一元化。  
亿万人民亿万兵，万里江山万里营！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文革派仗类：

誓作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文化革命齐造反，革命路上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党是我们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红色恐怖万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毛主席呀，毛主席！造反派战士想念你！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

文攻武卫，针锋相对  
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头！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火车）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国际类：

打倒帝修反（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  
我们一定要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  
把红旗插遍全球，插上白宫和克里姆林宫  
中阿（阿尔巴尼亚）友谊万古长青  
中朝两国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牢不可破  
中国是越南人民最强大的后盾，中国辽阔的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愿为越南人民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  
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

【往事如烟】

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七）

• 老 田 •

（续上期）

十四、意外牵扯进“10—27”开枪事件

1967年10月底，总参在渝的通信兵学院联合造反总团，请我们工总司六大司令部勤务员对该校做友谊访问，由我作报告，财贸井冈山的宣传队也一同去作拥军慰问演出。反到底六大司令部十来个头都去了，我记得起的有李木森、邓长春、段炳森、胡兵、汪友根、朱正坤、王以时这些人。这次访问的安排是：军地造反派联合通报情况，交流经验，讲贯彻九五命令、大联合和制止武斗的问题，是进行友好访问。军校的对外番号是412，位于歌乐山的林园，解放前是国民党主席林森住的地方。去了之后，学院造反派和院长都出来欢迎我们，请我们先开了个小型的座谈会，提出来我们跟他们的战士和学员作一个报告，介绍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文件精神，以及反到底受压的过程，邓长春和李木森先讲，他们讲的都很短。我最后作主报告，我讲了两派的分裂过程，一派夺权和二月逆流，最后中央“红十条”“红五条”否定了革联会，成立革筹组，最后讲了贯彻九五命令的体会。会餐完毕之后，军工的几个头要先回去，要我留下来看宣传队的演出。

在演出节目中间，该院八一五观点的对立派冲击会场，向演员扔石头扔小凳子，学员和干部自发围成一圈保护演员，看戏的人也有进行反击。我跟院长说干脆结束演出算了，发生冲突打伤人不好，演出也已经无法顺利进行了。他们就送我去比较安全的地方去等着，准备调车送我回市里，我不介入学校两派的是非，就安排我进警卫连连部。我正与指导员摆龙门阵，外面的战士来报告，有学员带枪冲击警卫连，连长和指导员说一定要把他们阻挡住。接着就报告突破了第一道岗哨抢了战士们的枪支，到了第二道岗哨，我对指导员说我还是离开比较好，这个指导员非常负责任，他说你一定要等一等，我们对你的安全负有责任，这个危险的当儿不能离开，出去有危险。接着就听见外面一个排长在那里高声宣布，我们是执行勤务的，没有介入两派，念了三条纪律，还选读了九五命令。结果没有起作用，外面越喊越凶，又听到战士发出警告，解放军一定要执行九五命令，你们不能再继续冲击了。然后就是鸣枪警告，两声枪响，这个大概引起了对方开枪还击，接着就听见一阵密集的枪声，不是一支枪，而是群射。我说一定要走了，指导员也没有办法，派了黄大德护送我从后面下山，走出指导员的办公室，经过一个坝子，我看到一片人倒在血泊里，有的人手上还拿着武器，男女都有，全部都是穿军装的，起码有三十个人，走楼上几个战士把着冲锋枪靠在栏杆内侧，倒在地上还有人喊口号要与“麻联总血战到底”。

我们一行数人，插身走过坝子，我精神还不是太紧张，跟我一起去的警卫员吓坏了，说老总伤的人可不少哇。我们从营地8点多下山，后山根本没有路，就是从灌木丛中间挨下去。我把军大衣交给任思成，他随手穿在身上，下山之后大衣被汗水湿透了。下山之后经过一片农田，就到了重庆大学的后门，此时就听见八一五的广播在叫：反到底的头头到412挑起武斗，现在打死我解放军和革命群众50余人；反军决无好下场。这个时候已经夜深了，八一五的广播都全部开了，都是同一腔调。我们走到小龙坎的时候，学校首长派了一辆中吉普赶上来送我们，上车的时候，我就看到五十四军全副武装往林园这边开，我们的车子就一路上给他们让路，我数了是九辆卡车，他们数了说是十二辆，总有两三个连荷枪实弹的兵力过去了。

我回到体育馆，六大司令部的勤务员基本都在，还有一些来体育馆避难的干部也坐在那里，他们表情都很阴沉，都吓坏了。我一回去他们就问我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没有主见了，我们回去的同志详细地向大家通报了事情的经过，并草拟了广播稿，等到八一五全市的广播过后，我们的广播才打开，也是几条标语口号式的表态：坚决支持412警卫连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向解放军开枪有罪，解放军自卫开枪有理，贯彻九五命令有功；决不容许冲击解放军的营地。我又连夜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告全市人民书》交给各个组织，当天晚上我主动打电话告诉张国华政委，他问我，是请你去，还是你自己要去，我说是应军校邀请去的。

当时我们都认为五十四军要派人保护体育馆，防止对立面恨可能要发动的冲击，结果没有。我打电话告诉白斌副军长，他说知道了，你不应该去，我们只找警卫连不找你。第二次打电话找白斌，他说不谈了，解放军有自己的规矩。我在重庆呆了两天，为了提防五十四军搞小动作，家属受到影响，我就与工总司和造反军的同志商量，问有无必要回避一下，大家都认为非常合理，还做了一些安排，我在出门回避之前发表一个声明，大意是说自己为什么要到4 1 2去，这是受到他们的邀请去作报告，本人的讲话通信学院有录音为证，有4 1 2广大官兵学员为证，宣传队演出的节目全系拥军内容，没有任何派性而受到袭击，现场有几千人目击，我们保留向成都军区、党中央汇报的权利；目前没有领导找我们谈，我们也不借机制造任何舆论，不管对方如何挑衅，我们都保持最大的克制，等待上级派人调查，我们相信解放军能够解决问题，相信军队主管部门和党中央的调查处理。我当时考虑如果去成都，会给成都军区和省革筹添麻烦，去北京也不是很合适，干脆走中间路线去武汉。

三天之后，找到钢工总的联络员陈兴明同志，他在东方红3 6号船上工作，当天晚上就上船，给了我们一间一等仓。那个时候造反军管财务的手上也没有钱，大家凑了点钱给我，不足1 0 0元钱，我和妻儿一起都去了武汉，总部还派了任思成给我作警卫。

到武汉之后我找到钢工总的朱鸿霞，他安排我住到青山那边去，离市中心比较远，朱的意思是除了与中央文革、周总理和武汉军区的曾思玉司令员、刘丰政委保持联系之外，对外一律保密。当时武汉是大雪天，我在那里整理给中央文革的汇报材料，期间还见过夏邦银，他是一个很老实的工人师傅，他加班完之后赶到青山，说要请客，找了一个馆子，弄了鸡汤、脆皮鱼什么的，很丰盛吃了一顿，他告诉我重庆来武汉的军人不少，要我小心谨慎。钢九一三李想玉派人来找我，叫我写一个收条，给1 2 0块钱，说是不用还的，还送了一些重庆方面的材料给我，传单上面都是一般性的辩论，说是要追查真相什么的。我把材料写好之后，去找朱鸿霞，当时他正在空军办的学习班里面，他看了我的材料之后，说战争一发生不得不死人，解放军也不会听你的命令，也不是你下的开枪命令，怪不到你的头上，何况中央有九五命令。过了几天朱鸿霞又把我安排在珞珈山下的一个干部家里，在武汉大学里面，住了半个多月，刘丰来见过我，提到反到底宣传队在他们那里演出的事情。

前后住了一个多月，我想回重庆，老婆还是不放心。我打了好多次电话才找到总理的联络员温伯华，他说他已经回到科学院了，不清楚情况，叫我过几天再打电话给他。过了三四天我打电话过去，他叫我不要问这个事情，也不要跟别人辩论，他说这个事情是军队内部的事情，由中央军委处理，事情已经通天了，林副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都知道了，叫我听候中央调查结果，他说回去没有结论，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中央直接管的事情谁敢伸手？

我就选择从西安路过成都的路线，到成都之后李大章见到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尽遇到一些大事？叫我住下等着，也是吩咐我不要出去辩论这个问题。我在锦江宾馆，邓兴国过来问我情况，最后他说那关你什么事？但是还是担心我的安全，他派人到宾馆里面来守着。这个时候省革筹在开一个建设方面的会议，喊我去会议上吃饭，会场就碰到很多熟人。梁兴初看见我，歪着个脖子过来，拿着筷子指着我说话，你到成都来也不跟我们打招呼，你把解放军打死了几十个。我刚刚要说辩解的话，他自己接着说，秦文斗我们已经抓起来了，警卫连全部遣散。后头我回到重庆，听说中央派了调查组做出结论，小道消息传说的结论与朱鸿霞的分析差不多，没有我的责任；梁兴初没有服气，在“批清运动”的时候，把这个事情又重新提起，要我交代，我说自己没有权力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中央军委直接主管的专案。粉碎四人帮之后审查我，又提出这个问题，我干脆说我不知道，后来起诉书倒是没有列入这个事情。

从此事，我联想到张国华曾经告诉我，说他和梁兴初入川工作时，毛主席喊他们去看武侯

祠门上的一幅对联“世外人法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中央几次开会解决四川问题，我很希望总理提这个事情，作个结论，他一直不提。在“10—27”事情上，我固然是无辜的，指导员秦文斗和连长也一样是无辜的，我从来没有与他们学校的对立面打过交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传说被警卫连开枪打死的人里面，有叶剑英的孙女，幸好有毛主席开口说话，和党中央主持公道，不然恐怕要整死我。

十五、从315指示到427指示的转折

1968年三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在北京空军政治学院集合，这是中央继红十条、红五条之后，第二次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传达毛主席的几条指示，每一条都是对八一五不利，把67年大武斗中间的矛盾和纠葛，都几乎要算在五十四军和八一五头上。说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文件下达之后，五十四军仍然是支一派压一派，军队没有一碗水端平。八一五回去之后思想立场没有转变，仗着军队的支持，还是坚持一派夺权，坚持以我为核心；还说不让反到底批判李井泉，反到底只有扎草人批判，引用毛主席的原话，说《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涂。军队也挨批评。反到底长期受压，处境艰难，听到这些自然高兴。

315指示下来之后，八一五达到几乎要瓦解的程度，头头们都是心情沉重，熊代富只有一句话“完了”，吴庆举说“没有啥子想头了”，周家喻躺在床上连床都不起，精神上基本上都垮了。周孜仁本派的人也骂他，说他不该叫人写那个《大局已定》的文章。这个文章出来以后，我们感到八一五的头头们太狂妄了，就连续组织了几篇文章进行批判，一批二批三批。

反到底感到扬眉吐气，尾巴是翘得很高的。反到底小报把毛主席的话用红字排印，一个字有鸡蛋那么大，有人找到我说，你给找一张这样的报纸，我给你五块钱。二七造反团刘祖国在八一五派的蔺习廉背后喊他：站到，听我传达最高指示“《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涂”，蔺习廉气得全身发抖，又想打他又不敢，那个时候八一五就像投降时期的日本人一样。这还是在北学习班里，在重庆就更加不得了。我喊周家喻出去耍，他一肚子怨气对我说，我倒告诉你，黄廉，政治斗争就象战场上的事情一样，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当时也感到反到底有些人经不起胜利的考验，军队干部的不服气是摆在脸上的，他们与八一五派一起有许多私下的动作。

梁兴初、韦统泰打电话给周家喻，给他出点子，说要稳住阵脚，沉着应战，夺取胜利。周家喻每天守着梁兴初，那些八一五的女同志守着梁兴初哭，五十四军各个机构都一齐给中央打电报说想不通，重庆的一些学校里面为宣传315指示又发生抓扯。梁兴初就拿着这些把柄去找中央摊牌，说军队想不通，群众想不通，武斗的苗头又重新出现了，他就是拿着这三条理由去扯皮，给中央和周总理施加压力。

4月27日，周总理又传达了毛主席指示，后来就通称“4—27”指示。说是跟他们讲一讲，“叫反到底不要翘尾巴”。接着就是刘张两挺作自我批评，张国华作自我批评，两个军表态。50军曲克济政委讲话，他说315指示下来了，他感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抓住了四川文革的主要问题，他认为是公正的、贴切的，派性是个教育问题，我们军队要帮助和支持左派，让他们深入地学好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要以我们自己的模范行动去教育他们，我们军队要永远支持左派。孙洪道军长讲的很简单，他说中央对四川问题费了很多心，我们不要辜负毛主席对四川的期望，两派都要多做自我批评，历史上骄兵必败，我们不要因为这些问题否定了主流，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到底，要依靠左派。五十四军讲话就有点恶狠狠，他们说派性是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私下拨弄，背后有黑手等等。

反到底下来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动不动就喊最高指示了，很多人都来找我表白，说他们没有出去喊这个，我说个人不能代表全派。我对周家喻说，反到底的人没有懂得骄兵必败的道理。造反派不是没有缺点，毛病是有的，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激情相结合的产物，要是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更加不行，勇气有余、智慧不足，缺乏政治眼光和长远考虑却是我们当中一些人致命的弱点。我眼睁睁地看着因为翘尾巴，而断送了一个大好形势。整个八一五对梁兴初真正是感恩戴德，周家喻后来告诉我，他这一辈子最感激的人有三个：第一是梁兴初、第二是韦统泰、第三是何云峰（与五十四军换防之后的13军政委）。他问我最感谢谁，我说以前我很感谢周恩来，每到我困厄的时候他就把我拔出来，后来我感到每当我按照毛主席的路线继续革命的时候，又挨了他的巴掌，特别是1971年“清查五一六”之后，我对周的看法冷淡了许多。周家喻说你没有良心，周总理对你不晓得有多好。

十六、进入革委会

1968年我们几千人，在空军政治学院办学习班，协商成立革委会，省革筹郭一民作我的工作，他是省革筹办事组组长，他说鲁大东也来了，你考虑一下结合干部的问题。我说开个会大家来讨论，他说我们个别征求意见，我说还有那么多干部，应让我们有个选择余地，隔两天再回答你。我去问刘结挺，他问我自己的印象，我说原副市长岳林很正直，也是个老红军，原则性强，再就是觉得王墨林可以，他算是多年来受鲁大东压制的，文革中间没有出来过，私下里是同情反到底的。刘结挺问张逸亭行不行？我说还不认识这个人，叫同志们把他们都接来北京。鲁大东对王恨之入骨，说他陷得很深。王默林说要结合叫军队来找我，我不要反到底推荐，这也许是他看不起群众组织，或者是刻意要与群众组织保持点距离。

在文革初期的时候，干部凡是与鲁大东有不同意见，他就说去找造反军嘛；岳林在会上不怎么说话，他就说会上不讲可以下去找造反军讲，鲁大东一直是把工人造反军当成是洪水猛兽，常用造反军去威胁干部。郭一民问我，鲁大东怎么样，我说中央同意我就同意。晚上中央文革有个干部来找我，说大东同志是支持你们的，我感到好笑。结果第三天，郭一民、刘结挺都来找我，说总理叫我传达给你，大东同志基本上是拥护毛主席的，他参加过七大，抓工业很有经验，重庆是老工业基地、军事工业基地，结合他对以后搞好重庆的生产是很有利的，这样市里面结合的干部就确定下来了，既然是传达，我就不好反对了，何况有言在先，我提岳林他们采纳了。省里面要结合的干部名单，邓兴国拿来给我看，李大章我是同意的，刘张当然就没得说的，张国华梁兴初是中央派的，另外有些人我也不是很熟悉，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我们。

群众代表不采取个别征求意见的方式，叫大家相互推选。坐下来一讨论，争论就非常大，军工对我意见很大，说黄廉是右倾机会主义，除了写几篇声明之外，基本上没有贡献，不仅是文人无用，还有黄廉是哪家人嘛，我们还搞不清楚。吃饭的时候，刘祖国跑来跟我说，你原来就是干部，现在还想革委会主任，没门。一些人在底下进行串联，说哪个敢选黄廉，当心下来挨整。造反军的人就说，黄廉选不上，谁也没有资格上。五十四军趁机在里头挑拨，蓝亦农、白斌、耿志刚故意把群众提名单给军工，还特意圈选我的名字，拿去征求军工、西师831、农民造反军的意见，军工的人看了之后眼睛都瞪大了，说是还有人讲“庆父不死鲁乱未已”，就拿起笔来把我的名字划掉。

周家喻下来拍我的肩膀，讥笑说你要当主任了，今天我请你去吃烤鸭喝茅台。刘结挺说平时看你群众关系还好呀，怎么回事？干部有人安慰我说，你一定要沉住气，你的历史地位不是几个人能够否定得了的。在名单上面，省革委会结合的副主任提名人选上，我和周家喻排在最后两名，拿下去讨论之后，把名单划得稀乱。最后周家喻改为省革委会常委，我根本没有了。刘结挺对我说，四川的问题还是比较复杂，这个名单只是征求意见，我说当不当副主任无所谓。

最有意思的是邓长春还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我们都是幸存者，如果武斗时候一炮打死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这个话倒是有理，平时看不出来，邓长春还是很会启迪人的。我说，对的，只要我能够活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能当个幸存者就算大幸了。八一五派的人对我进入革委会，是既不支持，也不与我为难。

这个时候我还有一个任务，是参加讨论四川革委会成立的社论，讨论致毛主席的致敬电，我推荐了沈世民和张怀珍，他们二话没说就接受了。刘结挺就社论题目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就叫四川很有希望嘛，他没有说明毛主席已经圈定了新华社拟定的《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吃饭的时候，他问我革委会成立之后，我怎么想，我说这几年来颠沛流离，感到很累，还想回木材公司去当宣教干事吧。他说，你看我的烟杆原来有筷子那么长，现在只剩下三分之一了，抽了多少烟就是有多少烦恼，他问我：你去川报当个记者行不？我很高兴，说要好好干，以后形势好了，给江青同志写信，请她帮助调到人民日报去工作，可以到全国各地去旅行。

吃完饭之后，各大班人员集中，宣布准备开会，喊钢笔指甲刀都要交出来，还安排三个人一组，相互监督。王兴国在我左边，邓长春在我的右边，交代我要招呼他们俩守纪律，主席出来后不要往前涌，不要丢四川人的脸面。我开玩笑说你叫左右看住我嘛，他很尴尬不好回答。六点半在大操场上汽车到人民大会堂，我们的座位是在第十七排，我对王兴国说我们串到第二排去吧，他说不行，邓长春说何必呢，他们都忠实履行要帮助我守纪律的指示。据说是要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都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一个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光头出来，宣读了几遍“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东方红乐曲响了两三遍之后，毛主席从大会堂舞台后出来，向我们频频招手，很短的时间，主席就进去了。主席一出来，后面就乱了套，有人从我的肩膀上踩过去，桌子上的小喇叭都被他们踩坏了。周总理和康生等中央领导主持开会，念中央关于成立四川省革委会的文件和常委以上的名单，除了张国华梁兴初、刘张之外，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群众组织有邓兴国、江海云、杨志诚、王恒霖、彭家治、但坤容、冯玉德七个副主任，周家喻是常委，坐在我左右的王兴国和邓长春都是常委，常委名单念完后，王兴国马上把耳朵贴到我的胸口，然后竖起大拇指对邓长春说：心脏跳动无异常。过了一下子，郭一民和刘张三个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对我说，黄廉同志，革委会委员的名单没有念，你是省革委会委员，我点了点头他们就走了。

出门之后大家上卡车回政治学院了，我没有上车，自己一个人去天安门要，十一点钟才回政治学院。郭一民马上就来了，问跑到那里去了，有重要的事情，说省革委会和军区、两个军的首长都在等我。我问有啥子事嘛，要开我的批判会呀。我进入大会议室，里面坐了一圈，张国华问我去哪里了，我说这点小事还要汇报呀。他接着说：我们跟你作检讨，怪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关于你的事情惊动了毛主席，毛主席问省革委会常委、副主任中间怎么没有你，我们感到不好解释，现在通知你：你已经是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委员，我们欢迎你参加省革委会的工作。有些事情现难以弥补，省革委会留了两个副主任空缺，是留给重庆市的。怪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主席操心这个事情，我感到很惭愧。他还说，你立即开始筹备重庆市革委会的工作，明天早上就回去作群众的工作，周家喻也同你一起去。张国华非常慎重，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说，他说完后，又说这是周总理传达下来的毛主席指示，我们省革委会、军区和两个军的领导集中起来给你传达。

接下来是梁兴初的表态讲话，他说：黄廉同志，我支持你的工作，你们一派里头还有派性，以后省里开常委会的时候，你一样参加，今天这个会是总理喊我们开的。接着是五十四军表态，说我们支持你的工作，明天派一个师长陪你们回去，重钢的纠纷一定要平息下去。李大章说：黄廉，一定要给毛主席争光争气，你还是能够工作的，主席说了嘛，造反有黄廉，怎么进革委会没有黄廉了呢？成都的50军郑志士、孙洪道也表态，说你的工作除了群众干部知道以外，

毛主席周总理也是知道的，将来我们努力工作，我们也支持周家喻，你们先回重庆去做好准备工作，回去传达中央的精神。鲁大东简单地说了句：我们今后要合作。

传达完了之后，都如同致欢迎辞似的。过了一会下，周家喻也被叫来了，我看出他也不是很高兴，张国华和梁兴初说，你们两个明天就回去，开始筹备市革委会的成立大会工作。

关于我进入省革委会引起毛主席的关怀讲话，以后的传说就越来越多，什么“黄连苦、苦黄连”咯，什么“一棵树苗要培育浇水”什么的，毛主席哪个会那么多话。以后省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甚至许多次副主任会议，都有我和周家喻参加，有人说你黄廉这个革委会委员也太特殊了点。

在重庆市革委会成立之前，我和周家喻曾去重钢传达会议精神，整个重钢是人山人海，完全走不动路，范廷贵、李邦富说干脆你们坐在车子上不要下来，找钢铁工人分道，把车子才开到主席台去。我们就是轮回到各个厂矿去做报告。

省革委会成立的时候，我们也去参加了，整个成都完全是人山人海，变成了不夜城，根本走不动路，整个城市搞得水泄不通，只要是大街小巷，都有游行队伍，硬是没有办法走。听说我们到了哪个地方，更是走不脱，我很担心搞得不好被人踩死了。邓兴国带我们避到新华印刷厂里去，给工人介绍说这是黄廉同志，工人掂了两捆毛选来送给我们，我说受之有愧，工人说我们就是印书的，需要就可以拿去。我开玩笑问有没有红楼梦，他们应声回答说有，立马就去仓库提了一套给我。

参加省革委会成立之后，我们就回到重庆，李大章代表省革委会来重庆宣读批文，那个时候重庆还在发生局部性的武斗。在成立革委会的前夜，二轻兵团打电话来说，八一五开枪打死了一个二轻兵团的人，他们一夜之间在市中区所有树上都披上了白花，像是死人出殡的样子。我们开革委会成立大会的时候，他们就组织抬尸游行，要强行冲上主席台，名义上是找周家喻的麻烦，实际上针对我。好端端一个会场，被他们一冲，气氛就完全变了。李大章说，黄廉，你看一看，这是你们那一派的人，武斗不停止，你制止得了吗？派性和武斗不停止，你副主任咋个当？蓝亦农和白斌问我怎么办，我说把尸体接下来，派一个排的解放军把他们逼出去，承诺由市革委会和军队帮助他们调查解决。

直到3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这个人根本不是八一五打死的，那个时候武斗没有停止，许多人去成都躲避，大家从成都赶回重庆参加革委会成立庆典，一个女学生从成都回来，与二轻兵团的人在一起，他们在上楼梯的时候，边开玩笑边上楼梯，一个人倒背着枪，不小心挂着扳机，结果枪走火打死了后面的一个“兄弟伙”。因为当时武斗的余波未尽，他们自己又不好交代，就说是八一五派打死的；加上他们对自己在革委会中间结合的位置也不满，所以就抬尸来闹会场。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深，是一个当年帮助抬尸体的中学生，最近才在酒桌上告诉我的，他说他们当年都是反对我的。

起先军队扶持的革联会夺权我们反对，在武斗反复的极度艰难条件下成立革委会，也一样顶着巨大的干扰，武斗和派性一样纠缠入骨。我当时认为还是要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既然社会上有那么大的干扰，我到革委会工作以后，大量就是做群众工作，消弭派性和武斗，但是军队支一派压一派的现象依然存在着。

文革中间由两句话广为人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斗私批修”，革别人的命往往很坚决，但是检查自己灵魂深处的私心，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造反派中间多数是投身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但是在胜利的时候也有些人难免带着点私心杂念，因此在运动

中间就相应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文革不能一次完成的原因。包括我本人也需要把自己的行为放到阳光下去供群众监督，这一次整理口述史也是一个自我曝光。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